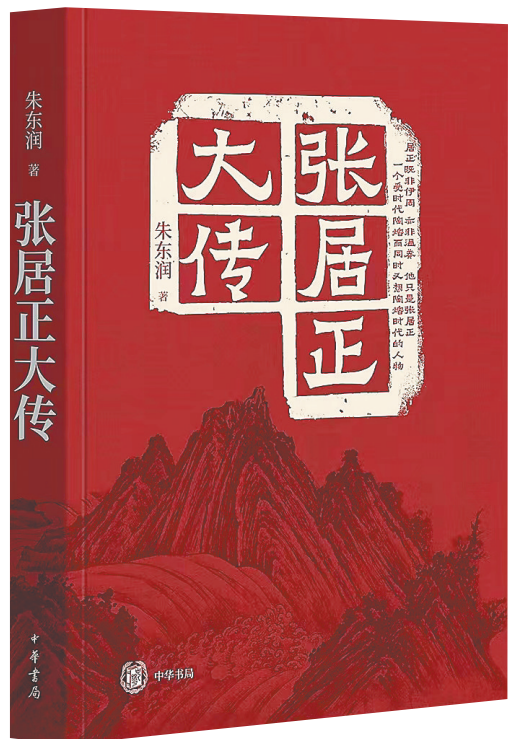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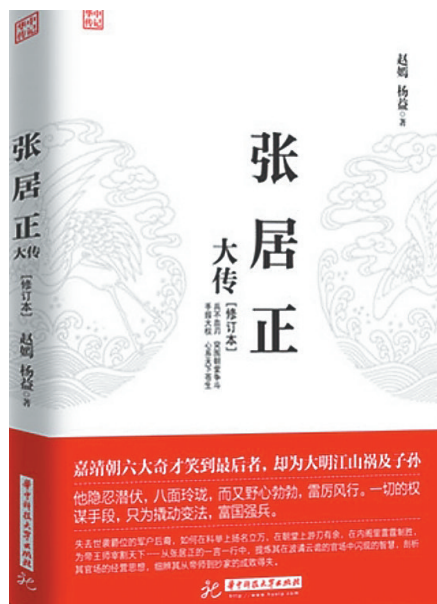


1943年8月,中央大学教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下了《张居正大传》序言最后一个字。第二年,书稿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——岁月如梭,这本被称为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”的作品至今已问世八十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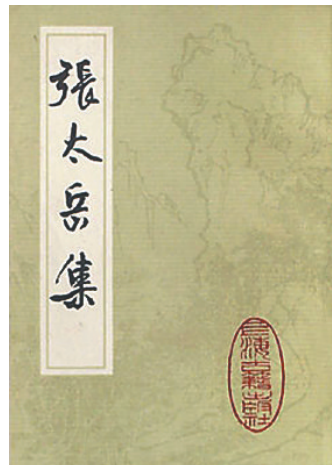
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,回国后辗转广西、江苏、湖北、四川、上海等地教书,在诸多学术领域耕植颇深,在传记文学方面更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,其代表作便是《张居正大传》。朱东润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是如何结缘的?《张居正大传》出版前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?事情还需从头说起。



朱东润著写的《张居正大传》



201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张居正大传》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《张太岳集》

传记出版几经波折

《张居正大传》脱稿后即交开明书店出版,此时朱东润已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。

开明书店是一家有名的出版机构,1926年在沪上成立,抗战期间总部迁往桂林,办事处设在成都。书店方面负责书稿编辑的是叶圣陶,叶先生不久前刚从武汉大学文学院(乐山)离开,与朱东润既是同事,也是朋友,对他撰写《张居正大传》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。叶圣陶为人谨慎,办事认真,他专门致信朱东润,对《张居正大传》封面题签一事作了说明:

稚老题签,可贵。因属钩摹,弟思刻工摹之,必失神采,不如自摹,然摹之数纸,皆视原样为逊。最难者小字,印章尤无办法。弟知刻工刻字,以原样反贴于木,视墨痕下刀,始不失真,而原样势必牺牲。今嘱同人姑令刻工钩摹,其技或胜于弟,若摹之而不成,只得牺牲原样。先此说明,请求垂许。

叶圣陶信中所说的“稚老”即同盟会元老吴稚晖,朱东润曾随其办报。《张居正大传》完稿后,朱东润请吴稚晖审阅,据说他连夜看完,并欣然题签。据朱东润后人回忆,此间开明书店由桂林迁往重庆,途中遭敌机轰炸,有一包已经铸成的锌版被炸毁,其中就有《张居正大传》的封面题字,后来只好重新再铸。

这部书稿于1944年4月开始排版,至9月才告结束,持续了接近半年时间,出版后在国内引起轰动。此后朱东润又相继完成了《王守仁大传》(书稿遗失)、《陆游传》、《梅尧臣传》、《杜甫叙论》、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、《李方舟传》、《朱东润自传》、《元好问传》等作品,继续在传记文学领域深耕。

这又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了。■



张居正画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与现代传记文学结缘

1938年深秋,正在家乡江苏泰兴闲居的武汉大学教授朱东润接到学校电报,大意是武汉大学已经迁至四川乐山,希望他在明年年初赶回学校上课。

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都落入日本人之手,朱东润感到一种极端的压抑和愤懑,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只身入川。12月初,朱东润离开泰兴,先由上海至香港,绕道越南,再经云贵入蜀。离开娇妻幼子,独自离乡背井,沿途目睹山河破碎,满目疮痍,朱东润心中有说不尽的痛苦和悲伤,但他明白,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。

1939年1月中旬,朱东润抵达乐山,重回文学院任教。不久,教育部颁文要求各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,传记文学在国内是个新鲜事物,许多学校都以唐宋八大家碑传类古文来应对,武汉大学也是如此。武大中文系主任刘隲指定一位教授开设此课,并且指名要讲韩愈和柳宗元。朱东润认为这条路完全错了,于是决定对此作一些探索和研究,其研究重心也由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转向传记文学。几年后,他在《张居正大传》序言开篇如此写道:

二十余年以前,读到鲍斯威尔的《约翰逊博士传》,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,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,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。在那一年,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,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,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。

当时大部分学者认为,传记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,从老祖宗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时代就已

经开始了。但在朱东润看来,秦汉的史传、六朝的别传僧传、唐宋的碑传、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评传,虽各有所长,但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遗憾。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,碑志过于刻板虚假,年谱不免具体而琐碎,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,有“大卸八块”的遗憾。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,应该以确凿可信的文献作为依据,尽可能真实、形象地还原传主的生命历程。

在这个背景下,朱东润开始了对现代传记文学的探究,尽可能搜寻能找到的中外典籍,其间,他阅读了《名人传》《人格论》《传记综论》等西方传记文学和理论作品。通过阅读学习,朱东润认识到现代传记文学除描述传主一生境遇外,还要将其所处时代、精神面貌,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列出,这样才能烘托传主的形象。

朱东润陆续撰写了《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》《传记文学之前途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》《传记文学与人格》等学术论文,还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作了系统研究和梳理,成果就是10余万字的《八代传叙文学述论》。这些研究和探索都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,当时抗战正处于艰难阶段,朱东润虽处蜀中偏僻之地,陋室粗衣,但仍笔耕不辍,他在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窘况:“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,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……但是逢着寒风料峭、阴雨飞溅的时候,只得以围巾覆臂,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,执笔疾书。”

这次转型确定了朱东润后半生的学术道路,此后几十年,现代传记文学成为他研究和写作的中心。

还原有血有肉的张居正

1941年,朱东润决定写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人物传记,但选择谁作为传主呢?

作为传记作者,常不免怀有这样的私心,就是希望传主越惹是生非越好,越反常逾矩越好,越惊世骇俗越好。因为只有这样,作品才容易出彩,读者也愿意看;否则,要在平易中写得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,那的确是不大容易的。

朱东润自然明白这个道理,虽然“田夫野老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”,但一个普通人注定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,因此只能从大人物入手。可历史上的大人物成千上万,有的是朱东润熟悉的,有的是了解甚少的;资料方面也是千差万别,不是少得无从探取,便是多得无法收拾,抗战期间,大学图书馆图书资料之缺乏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除这些困难外,还有许多其他因素,传主时代距现在太远不好,太近了也不行。“那一个秋天,我因为传主的选择,经过不少的痛苦。”朱

东润在《张居正大传》序言中这样写道。

最后朱东润决定为明末大臣张居正作传。张居正是万历皇帝首辅,在历史上赫赫有名,其人其事至今未有定论,“誉之者或过其实,毁之者或失其真”。在当时历史背景下,朱东润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传,可以说是煞费苦心,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高明之处。

今天看来,《张居正大传》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传记作品,史料真实有据,语言形象生动。这本传记还有一个重要特点,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。朱东润在《我怎样写作〈张居正大传〉》的“中回忆说:“我认为要写张居正,就得交代一个恰如其分的人物,是怎样的人物就得交代一本怎样的传,不夸大也不缩小。他有伟大的成就,也有无可讳饰的缺点。”在这个方针指导下,朱东润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居正,一个真实可靠的张居正。



朱东润 (1896年—1988年)

朱东润与《张居正大传》: 现代传记的坎坷『开山』

■ 王凯